

上篇 清末浙江留日学生

第一章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

在 17—19 世纪，日本幕府和中国的清朝政府不谋而合地实行“锁国”和“闭关”政策，其结果是闭目塞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国家不断走向衰退。然而，进入 19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两国不得不进行历史性的抉择。

1854 年 3 月，日本与美国遣日特派使节培里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宣告锁国时代的结束。1868 年，事实上统治日本长达 260 余年的德川幕府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明治新政府，日本历史自此从近世迈向近代。而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一切效仿欧美各国现行制度”成了政府推行改革的基本方针。在此背景下，日本通过不遗余力地汲取西方近代文明而开始大步迈向世界。

清朝政府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四邻诸邦为“蛮夷戎狄”。然而，自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我国国门后，部分国人才渐感“外夷”乃非我邦所轻易能敌。诚如李鸿章所言：“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①为求生存图强，除通过培养近代化人才，致力于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以推进中国近代化之外，别无捷径。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清朝官吏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新式船炮，抵御外敌的侵略。洋务官僚们也主张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学习西方先进的

军事技术和应用技术。然而事与愿违，甲午一役，中国竟惨败给“蕞尔小国日”本，人们方知几十年的洋务新政不仅不足以敌欧美，就连维新不久的日本都难以抗衡。“日本小国耳 何兴之暴也 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 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 愤其国为西洋所胁 率其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 或学政治工商 或学水陆兵法 学成而归 用为将相 政事一变 雄视东方”。^②张之洞此言道出了日本迅速强盛之原因所在。

痛定思痛 朝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 以日本为媒介摄取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国求存图强的捷径。这是因为日本和中国相比，在政治体制、思想意识、历史文化、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均有许多共同或相近之处，而且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能为中国提供许多直接可以借鉴的经验。

清末中国“以日为师”大致可归纳为派遣学生留日、赴日参观考察、招聘日本教习、翻译日本书籍等四个主要途径。它们各有特点，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为壮观的场面。

上述四种途径中，留日学生的派遣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

留日风气的形成，除与上述时代背景直接相关外，有识者的倡导，与欧美相比日本所具有的路近费省等优点，日本当局的劝诱等也是重要因素。当时 在主张派生留学日本的人物中 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 1898 年所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 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精辟。“至于游学之国 西洋不如东洋 路近省费可多遣 去华近 易考察 东文近于中文 易通晓 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 无过于此”。^③此外，日本于甲午战争后在接

受中国留学生问题上也表现出了难得的热情与“高姿态”。1898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之名义通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该国政府愿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从许多史料中我们可以察知日本此举乃是以“倍敦友谊”之名行培养亲日人士之实。^④而中国则正希望通过师日之长以自强，双方各具目的。清末留日运动在此背景下展开，并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

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缘起、演变过程，留日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文化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文学、翻译出版等各方面的影响和贡献，学界所作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目前笔者所见的专书及专章论及的著作，主要者就有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1928）、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东京，1931）、石锦《中国现代化运动与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67）、实藤惠秀《增补·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东京，1970）、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75）、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台北，1976）、上垣外宪一《日本留学与革命运动》（东京，1982）、阿部洋《日中教育文化的交流与摩擦》（东京，1983）、小岛淑男《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东京，1989）、阿部洋《中国近代教育与明治维新》（东京，1990）、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东京，1991）、王晓秋《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北京，1992）、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1992）、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1992）、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北京，1995）、王奇生《留学与教育》（广西，1995）、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1996）、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辽宁，1997）、斯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1999）、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记录》（珠海1998）等。国内外所发表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胜枚举。

清末留日学生运动的发展在全国各省之间极不平衡。以清国留学生会馆于 1903 年所作的调查为例，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 19 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 人）、浙江（154 人）、湖南（130 人）、湖北（126 人）、广东（108 人）、直隶（77 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⑤造成这一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除各省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之外，尚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

然而，从上列有关留日运动的专书也可看出，目前对留日学生的研究大多尚局限于整体和宏观阶段，对某一区域或某一时期所作的局部和微观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从这一角度看，对留日学生的研究尚有许多待做的课题。本书上篇将留日学生的研究范围局限于浙江也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

纵观清末浙江留日运动的发展，若根据政府派遣情况和留日学生的数量加以分析，笔者认为可细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时期：1897—1898 年，浙江省在这一时期的官费派生留日工作为各省首倡，故亦可称“首倡期”。第二时期 1899—1900 年，在这一时期浙江省的官费生派遣出现停滞，赴日者仅为少数几名自费生和北洋、使馆官费生，故可称“停滞期”。第三时期：1901—1905 年，1901 年浙江省重新开始派遣官费生，此后，赴日的官费生和自费生均逐年递增，至 1905 年达顶峰，故可称“递增期”。第四时期：1906—1911 年，这一时期，无论是官费生还是自费生，在总人数上呈逐年减少趋势，故可称“递减期”。

本章着重就上述第一时期即 1897—1898 年浙江省派生留日情况，和非浙江省派遣的浙江籍留日学生情况，结合中日两方面的史料，主要通过考证的方式加以梳理，以澄清学界对这一时期浙江留日学生的诸多不一说法，同时对这一时期浙江留日学生活动中最为突出的译书活动进行考察。

第一节 近代中国最早的地方官费留日学生

一、13名使馆学生的赴日

中国最早选派留日学生始于何年 要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须回顾一下创始于 1882 年的中国驻日使馆内的东文学堂。1877 年 以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 张斯桂为副使 黄遵宪为参赞的清国驻日使馆在东京设立。赴日当初 由于以为中国与日本文字相近 加之当时国内一时也无合适人选等种种原因 而没有从国内带去专门的翻译。可是在一年后 何如璋便向总理衙门称：“东文翻译最难其选 因日本文字颠倒 意义乖舛 即求精熟其语言者亦自无多 臣等只得暂觅通事二名。”^⑥有鉴于此 何如璋立即奏请招募华童赴驻日使馆学习日本语言文字 以备将来之选。遗憾的是在他的任期内未能付诸实施。^⑦1881 年 清政府任命黎庶昌为第二任驻日公使 黎同样以使署理需用东文翻译为由 再次奏请招收学生设馆肄业 以三年为期 不久获准在使馆内设东文学堂 于 1882 年开馆。^⑧自此，使馆陆续从国内选拔学生赴日 由使馆延聘日人为东文教习来馆授课 以培养翻译人才。甲午战争前后 学堂一度中止。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裕庚任驻日公使。遵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旨意，裕庚在上任后不久即着手在使馆内恢复设立东文学堂 并计划就地延请东文教习 认真训课以期有成。但是 后来在与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协商时，对方建议与其在使馆内闭门授课 不如将学生送至日本学校学习。西园寺氏认为 在馆内学习 每日不过数小时 其余仍说华语 难以有成 以前馆内所招的学生成才甚少 原因也在于此。裕庚采纳了西园寺公望的建议 并

打算今后对招来日本的学生严加管理 如发现有不求上进、不堪造就者 随时遣回 决不迁就。裕庚将此计划汇报给总理衙门 总署 随即函复裕庚 认为所拟计划切实可行。此后 裕庚遂派驻横滨领事吕贤笙赴‘上海苏州一带’招募唐宝锷、戡翼翬、朱光忠、胡宗瀛、吕烈辉等 13 名学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初五日抵达日本东京使署。但是 这 13 名学生并非均来自上海、苏州一带 如唐宝锷为广东籍 戡翼翬为湖北籍 其中吕烈煌为安徽籍 系吕贤笙之族亲^⑨。

关于这 13 名留学生的姓名，实藤惠秀在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开头就提到：“1896 年旧历三月底，清朝首次遣派学生十三人抵达日本 他们是 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戡翼翬、吕烈辉、吕烈煌、冯闾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以后这一说法几成定论并一直为学界所沿用。但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中收录的驻日公使裕庚五月初八日致西园寺公望的书信中所附的名单可以得知，这十三人分别是 韩寿南（23 岁）、朱光忠（22 岁）、冯闾模（20 岁）、胡宗瀛（20 岁）、王作哲（19 岁）、唐宝锷（19 岁）、戡翼翬（19 岁）、赵同颀（19 岁）、李宗澄（18 岁）、瞿世瑛（18 岁）、金维新（18 岁）、刘麟（18 岁）、吕烈辉（18 岁），二者之间朱忠光（朱光忠）、冯闾谟（冯闾模）、韩筹南（韩寿南）、李清澄（李宗澄）、吕烈辉（吕烈煌）各相差一字，王某和赵某各是王作哲和赵同颀。此外 两者虽都是十三人 但其中一人（各为吕烈煌与瞿世瑛）全然不同。笔者再次查阅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裕庚 光绪二十二年 十一月初三日致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书简 发现当时李宗澄、韩寿南、赵同颀、王作哲四人已经回国 作为补充 使馆再次从福建和安徽分别招来 22 岁的黄涤清和 16 岁的吕烈煌，将他们送入前面 13 名（除已回国者）学生所入的学校。因此，很明显，实藤惠秀所提到的吕烈煌是以后来日的，

而瞿世瑛应该补入五月初五抵日的学生名单中。据笔者管见，以往似尚未有研究涉及到李宗澄等四人回国后所补充的二人的来日情况。

13人抵日后，裕庚将他们的教学委托给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再由西园寺公望转请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教学。嘉纳在附近的神田三崎町租一民房作宿舍兼教室，并派该校教授本田增次郎任监督，更请教员数人进行教学。东文授课在住宿处进行而数学、理科、体操等普通课则借用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室进行授课。^⑩

这13名学生中，共有四人（姓名如上所示）不久或因“纨绔成性、紊乱规则”被“登时撤令内渡”，^⑪或因频频受到日本小孩“豚尾奴豚尾奴”的嘲弄，加之不适应日本食物而弃学回国。^⑫

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以《宏文学院沿革概略》为依据，认为“政府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始于光绪二十二年”。^⑬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中也认为上述13名学生的赴日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⑭黄福庆在《清末留日学生》一书中则称：“此13名留日学生并非清政府计划下所派遣者，当时清廷尚无固定的留学政策，裕庚此举只是基于驻日使馆业务上需要之半官方的‘使馆学生’。惟他们已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就读，故应视为中国最早之留日学生。”^⑮

对此持否定论者也不鲜见。如桑兵在《留日学生的发端与甲午战后中日关系》一文中指出，这些青年的所谓“留学”不过是在延续原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的略加变通，即将使馆独办的东文学堂改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学校兼管部分教务，课程由专务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学校附近，但这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因为使馆培养翻译人员这一培养目的没变，学堂及学生隶属于使馆这一隶属关系没变。并且

为“1898年3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达东京，是为中国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⑥但据笔者考证，杨荫杭等人的赴日时间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他们并不是1898年中国最早派遣的留日学生。

细野浩二和王宝平则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认为使馆招至的学生张文成、唐家桢、冯国勋等人已经进入中村正直和三岛毅的学塾中学习。若以进入日本学堂学习为界定留日学生的标准，那么他们已可称作是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⑦

汪叔子将官费赴日留学的最初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将1882年东文学堂开馆作为近代中国官费留学日本之始，迄至甲午战争爆发，称“原始阶段”；自裕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赴日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为“转变阶段”；自“百日维新”至同年清政府确定留学日本的政策为“确立阶段”。^⑧

笔者认为，这十三名学生恰恰处在一种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从他们被派往日本的经过、学习目的及隶属关系上看，与前使馆内的东文学堂学生无异。从他们进入日本学校就读这一点上看，虽然在此之前也已有有人进入日人经营的学塾学习，但这仅是个别现象，十三名学生全体同时被安排进入日本学校就读，则为后来者之先。因此他们可以称作是使馆招至的特殊留日学生，而并非是国内最早派遣的普通留日学生。

二、杭州蚕学馆率先官费派生留日

那么，中国最早正式从国内派遣留日学生又是始于何时何地呢？先看1897年的留日学生情况。

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堪称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最有影响的人物。自20年代起，他即着手搜集清末以降有关中日文化交流

的史料，并立志要撰写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著作。经 10 多年的努力，获得数千种与留日学生有关的图书和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于 1939 年写成《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由东京日华学会出版。战后，他重新改写“史稿”，经多次增订改易，于 1960 年以《中国人留日学生史之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出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1970 年再次增订出版。该书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原因、留学经过以及留学生在日本的文化、政治活动等，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未涉及 1897 年赴日的留学生。附录中，所载 1897 年的留日学生数为 9 人，而这 9 人就是 1896 年赴日的 13 人，除去抵日二三个星期后，因“觉得日本食物难以下咽，恐怕会伤害健康”而归国的四人，后留在日本的学生。^⑩即实藤氏在该书中没有提出 1897 年赴日的留学生。继此书之后，几乎所有涉及早期留日学生数的文章和著作，或是不提及 1897 年的留日学生数，或是延用实藤惠秀的观点，认为 1897 年的在日学生数为 9 人。如：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未涉及 1897 年的留日学生数，南开大学李喜所曾对 1896—1912 年的留日学生人数列表统计，但缺 1897 年；^⑪王晓秋则延用实藤惠秀的观点，认为 1897 年的在日学生数为 9 人。^⑫

自 80 年代开始，也有研究者指出浙江省于 1897 年曾派 2 人留学日本，并认为浙江省官派留学生去日本较其他省为早。^⑬但未见该 2 名学生被派遣的经过、赴日时间、留学情况等详细研究报告。

笔者认为，中国最早从国内正式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是浙江的嵇侃和汪有龄。1897 年由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报》，几次提及了杭州蚕学馆派生留日的内容。

杭州蚕学馆已于上月十三日开学，学生三十人，备取学生三十人，额外二十人，留学日本者二人。^⑭

(杭州蚕学馆 出洋学生 湖州德清附生嵇侃、杭州钱塘附生汪有龄 丁酉孟冬赴日 戊戌夏 汪有龄奉浙抚廖中丞 改派东京学习法律。现在日本东京琦玉县儿玉町竞进社内习蚕，每月由学馆供给伙食束脩外，各给月费洋十元。^②)

《农学报》的上述记载大略表明了杭州蚕学馆派嵇侃、汪有龄赴东留学的时间、学习科目以及经费提供情况。

再看日本方面的资料。《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系兴亚院政务部通过委托日本专门学校以上的各学校进行调查后，于昭和十五年(1940)编成。尽管如其序言所述的那样，难免存在一些疏漏和错误，但不失为了解留日学生情况的一种珍贵的原始材料。在“东京高等蚕丝学校”一栏内 共有毕业生 64人 除嵇侃一人外，其余 63 人的毕业年月、专攻科目、原籍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唯嵇侃一人的毕业年月、专攻科目栏空缺。这一空缺不全 恰恰透露出嵇侃可能就是该校最早的中国留学生。

《浙江潮》系浙江留日学生在 1903 年于东京创办的刊物。其第 7 期 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一文载：“……至若吾浙江者 岁丁酉已有官派学生嵇君侃“伟”疑“侃”之误)汪有龄二人到东学蚕业 于辛丑年夏卒业回国。汪君以病早回国 嵇君是为中国官派学生至日本之滥觞。”足见嵇、汪两氏的留日在当时的留日学生界并非鲜为人知，浙江留日学生还以本省能最先派生留日为自豪。

三、杭州蚕学馆概况

杭州蚕学馆创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准设年月)馆址在杭州西湖金沙港，是中国最早的培养蚕桑专业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蚕学馆能在杭州首创，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世界蚕业首推亚洲，亚洲则以中国为最，而中国又以江浙为盛。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丝绢残片，证明浙江在公元前2750年前就已有蚕丝生产。^⑤而至近代，日本蚕丝业发展迅猛，其原因在于日本能不断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养蚕法，同时国内又有一批致力于蚕业研究的人才。19世纪末蚕瘟微粒子病蔓延，日人学习法国技术采用600倍显微镜逐一检验蚕种母体，淘汰带病蚕种，有效地控制了蚕瘟。而在中国，由于蚕病的蔓延，蚕业生产衰退，蚕丝质次价昂，出口日减，蚕利被日本所夺。而当时的蚕丝出口，正如杭州府太守林启所言：“就时局而言，为中国之权利；就王政而言，为百姓之生计；就新法而言，为本源之本源；就浙省而言，为切要中之切要。”^⑥如何挽回中国蚕业之衰势？设馆传授推广日本新技术被认为是一条有效途径。当时浙江宁波海关税务司康发达曾著一书，书中言及中国若不对蚕瘟加以重视，倘遇年岁不好，蚕子将有灭绝之一日。他认为倘若设学堂以资改进，只需三年就可以见成效，每年经费以银三万余两计算，三年只需十万两，即可挽回蚕丝之利。^⑦这对于当时以蚕丝为出口之盛的浙江来说，可谓是一本万利。而倘若学堂真能在浙江首创成功，其他各省必来仿效，这对于当时迫切希望领风气之先的浙江省来说，更可谓机不可失。

另一方面，林启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调任杭州知府以来，积极推行新政，主张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认为振兴浙江实业应以蚕业为要。他目睹民间养蚕连年欠收之现状，决定采纳康发达所著书中有关蚕务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稟请当时浙江巡抚廖寿丰筹款创设养蚕学堂，先请试办三年，经费拟照康发达所拟十万之数，后减之又减，以三万元为额，划分三年。同年七月浙抚总署批准开办，林启亲任蚕学馆总办。^⑧

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初一日，蚕学馆开始在杭州西湖金

沙港关帝祠旧址动工兴建馆舍，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二十九日竣工，共用去建屋费约银九千三百两。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1898.4.1）蚕学馆开学。所设课程包括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土壤学、桑树栽培学、蚕体生理学、蚕体解剖学、养蚕学、显微镜操作、制种、蚕茧检验、生丝检验等。学制二年。初聘曾被派往法国学习的江生金任总教习。江辞职后，经日本驻杭领事馆的介绍，改聘日本宫城县农学校教谕轰木长担任。“馆正”初聘邵章，邵辞后改聘沈铭。“学生数额三十名，不论举贡生童，有能家世业蚕，文理通顺，年在二十左右，阴敏笃静者，准其报名投考。惟短视人于显微镜不相宜”。首期额内学生实到 25 名，自贴伙食，不交学费的保送额外生 8 名。第一届实际毕业者共 16 名，他们大多被派往杭嘉湖宁绍五府所创的养蚕会充任教习。^④

蚕学馆于 1908 年改名为浙江中等蚕桑学堂。以后，虽经数次易址和改名，但其作为蚕桑学校的性质始终未变，并且自创办至今，学校几乎从未中断过。现浙江丝绸工学院、浙江大学蚕学系等前身均为杭州蚕学馆。

四、杭州蚕学馆派生留日的经过

蚕学馆派学生留日的时间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获准设立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正式开学期间。林启在向浙抚申请设立蚕学馆时，曾草订学堂章程。节录如下：

学堂以省垣为主，学生学成后，即分带仪器，派往各县并嘉湖各府，劝立养蚕公会，以为推广。教习或两人，或先请一人。学生年在二十内外，要聪明静细，并已通文义者，招考时先录取三十名或五十名存记。学生课程，须由教习手定大概。广购六百倍显微镜，酌量经费，愈多愈好。先行翻译日本蚕书

图说 成书后要广为传播(蚕室温度)亦宜以寒暑表为准 日本此表价值不过百文 当由局采买 听民间零星来购。学堂初创 修造房屋 购买外国仪器 用款颇为浩繁 今请款三万六千两 开局须先支六千两 以后三年 每年各一万两。^④

此章程对延请教习、招生要求与名额、学生课程、购置仪器、翻译日本蚕书以及经费开支等都有所规定，但未提及派生留日一项。

在蚕学馆筹备期间，建议林启派人留学日本的是罗振玉和孙淦。^⑤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 浙江上虞人 后迁居江苏淮安。在创设农学会之前，其主要精力大半耗于经史考据之中。1896年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罗振玉得知后，“莫名钦佩”认为中国“欲开锢闭 则兴学校为要图 而开学校之先声 则报馆为尤急”。^⑥进而与友蒋伯斧商议“中国事”觉得惟振兴农学 最易试行，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与蒋在上海发起农学会，刊行《农学报》。《农学报》除刊登有关农事的报道和消息外 主要还登载译自各国的农学著作和文章，其中尤以藤田丰八译自日本书报者为多。次年又创东文学社，培养了樊炳清、王国维等诸多人才。

孙淦 字实甫 浙江人，一作上海人(后述)大阪华商。与汪康年、罗振玉等交往甚多。他不仅建议浙江省派人赴日习蚕 还从日本寄显微镜等急需器具给农学会，让其转赠给浙江蚕学馆。^⑦对此 林启曾有“孙实甫先生英英向义 于人情物理又甚有理 我辈读书人愧之”之感慨。^⑧浙江最初选派学生赴日时，他还被浙抚廖寿丰举为留日学生监督。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后，他又是该馆积极的“赞成员”。^⑨

林启在罗振玉、孙淦的建议下 开始选派留日学生。其选派经过 虽然缺乏详细的记载 但当时林启给汪康年的一封手札却能给我们提供诸多线索。现照录之。

再启者 派生往东洋学蚕 前系实翁 指孙淦 笔者 云三人，一切只费千元，弟仍托其到时再查。兹尊函云每名须五百 弟本拟只派两人 半则经费为难 半则外间之论蚕学 均云法胜于日。今蚕会第十四册东洋论蚕，亦自言不如意、法、支那。此虽精益求精之意，要其不如法国，则西人公言之。故只添派一人与嵇生同学。弟同乡亲友及浙垣门生求去者多，均不敢假借 暗中觅得德清沈秀才锡爵 养蚕甚熟 人似明静 但相知未久。正在斟酌间，得尊函举有一人，汤蛰翁亦拟代为觅一人。蛰翁贤名，弟早闻诸何太守与足下，皆深顾大局者，实为信佩。但鄙意只添派一人，烦足下与蛰翁商酌，谁为可派之人，即以派往东洋。冶游之地，须择聪明而笃静者方好，已否学蚕，尚为不拘。二君均为蚕学觅人，非为人觅入蚕学也。添派一人择定后，尽可前发，不必函商迟滞。汤蛰翁为问安，此信乞呈鉴为禱。再问箸安。弟林启又顿。初一日。又：派定后 须急行 急学东国语文 明春学蚕方来得及。孙实翁云 行费由上海徐菊如先兑 该生凭札 所派一人 何县、何名 乞函示），俟弟补寄。弟林启又顿首。初一日（汪注：十一月初九到）^④

林启此信 是在汪康年和汤寿潜 原名震 字蛰仙 两人都提出愿为他推荐一名赴日留学生，但学额只有一名的情况下，决定让汪直接与汤商量，选择其中一人作为赴日生后，给汪康年的答复和说明。结合《农学报》所载《杭州蚕学馆表》中“湖州德清附生嵇侃、杭州钱塘附生汪有龄，丁酉孟冬赴日”^⑤的记载，我们不难得出：1.孙淦等人最初建议派遣的留学生是三人，林启出于经费等各方面的考虑，才决定只派二人；2.嵇侃和汪有龄并非同时赴日，嵇侃在林启十一月初一日致汪康年上述书简时已赴日，即他的赴日时间在孟冬十月，而汪有龄则是在十一月初九日汪康年接林启书简后，得

到汪康年或汤寿潜的举荐才得以赴日的。

汪有龄究竟何时赴日，属谁举荐？这在他抵日后写给汪康年的书信中有较详细的记述。十一月十六日傍晚，汪有龄与汪康年道别后即登上轮船，因该轮装货未毕，直到十七日下午一点钟才出发。晚上，货轮搁浅，不能开行，至十八日破晓方行驶正常。二十一日清晨进日本马关海口，二十二日下午一点过后，轮船行抵神户。时正遇孙淦赴东京办事，故暂宿在神户孙的友人王鹤庭家中。在信中，他还对汪康年的鼎力推荐，无比感激，表示“但求稍有心得，庶君可以对林公，鄙人可以对君”。^⑧

汪康年对汪有龄鼎力推荐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之间的族亲关系。汪有龄在有些信件中直称汪康年为“穰卿吾侄”，汪大燮为汪康年的堂兄，而汪大燮称汪有龄为子健叔，可见汪有龄与汪康年是叔侄关系。

五、杭州蚕学馆嵇、汪二生的留日经过^⑨

嵇侃抵日后，先在孙淦处小住，不久迁往山本宪的私塾中，就山本学习东语，后因政府护照尚未接到，常被巡捕查问，故又将行李搬回孙淦处。在得知汪有龄已抵神户后，嵇侃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从大阪前往相见。这是他们两人的首次见面。此次相见，两人“谈论甚洽”，于是同进大阪，一起住孙淦处。

初到日本，因不谙东语，未能与日人接洽，且每见日本报纸，虽“眼痒难熬”，但又看不懂，深以为憾，只是两人“朝夕讨论，尚颇有乐趣”。不久，汪有龄也师从山本学习语言，一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十五左右入东京崎玉县儿玉町儿玉村竞进社学习蚕学。两人从山本学习日语约三、四个月。

嵇、汪两人赴日后，师从山本，这与山本此前和汪康年、罗振玉

的接触直接有关。

山本宪(1852—1928)号梅崖自幼好读史书为生计当过技工。1879年进“大阪新闻社”担任记者,1881年受邀成为《稚儿新闻》主干人物翌年《稚儿新闻》停刊后任《中国日日新闻》主笔不久因该报停办而失去工作。1883年在大阪开设汉学塾,后曾因故被捕入狱,出狱后在继续经营私塾的同时,为多家报社撰过稿。1895年受聘成为关西法律大学(现关西大学前身)讲师次年因眼疾而辞。1897年秋冬季游览了中国的天津、北京、上海、苏州、汉口、南京等地并著游记《燕山楚水记游》。在上海期间经古城贞吉、藤田丰八的介绍结识了汪康年、罗振玉、梁启超等人。以后与汪康年、罗振玉交往甚多汪康年常将《时务报》寄与他而山本也不时摘译一些如《朝日新闻》等日本报纸上的文章寄给汪康年刊于《时务报》同时也为罗振玉翻译书报寄送到上海。

嵇、汪二人从山本学习日语虽仅三、四个月但据山本所言二人均“语学大进可刮目”,^④至三月中旬已是“操语甚熟”。^⑤这虽是他称赞两人并略带夸张的套话但也从一侧面反映出嵇、汪两人的学习情况。

嵇、汪二人在进蚕业学校竞进社蚕业讲习所后正是春蚕饲养季节。特殊的学习内容决定了他们的学习方式是边学边干在实践中得到学习。这一期间他们刻苦好学的精神深受好评尤其是嵇侃“在竞进社甚攻苦天雨采桑跣足行十余里”林太守得知后甚为欣慰还寄去银40元以资奖励。^⑥而汪有龄因身体原因不能过耐劳苦他本人也因此深感遗憾表示只要力所能及必全力以赴。

嵇侃在竞进社内学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继而改入东京西原蚕业讲习所再习一年。^⑦后来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学习,^⑧毕业后于1901年夏回国。^⑨罗振玉曾在《杭州蚕学馆成绩记》一文